

自序

多民族乡村的活态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新探

2005年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引申为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积极社会因素，2005年国家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地区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学费，国家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2月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十一五”计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发展方向。新世纪初叶悄悄走进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短短五年中一蹴升迁，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走到了同一个现实的生存空间。

跨入新世纪，在短期的五六年时间内，面对社会公共空间的多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尤其是乡村社区的民间文化传统，在主流文化与国家文化理念的价值观念中发生着深刻快速的变化。在当下的中国，现实生存所发出的价值需求，已开始超越和打破原有文化传统白话语、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时代在召唤和催促着中国一个文化自觉传承和文化创造时代的到来。教科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走入急剧变革的中国，不仅仅意味着狭义的不同文化类型保护的单一问题，在现实中，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的重要因素往往是由许多非文化因素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价值现在中国的认同和普及推广，打破了旧有官方和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分野的壁垒，使长久处于边缘、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开始拥有与官方精英文化平等的文化身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传承群体的乡村农民，开始作为文化的传承主体得到社会价值的文化认可。当然，在社会体制上及民间真正的文化尊重还相差很远，但这种价值观的倡导和实现已成为必然。反思近百年来民间文化的处境，大都处于一种社会化情感资源的使用，我们对民间文化的感情往往是暧昧和淡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的提出，使不同民族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价值突显了出来。这使21世纪初在中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具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基因价值的认知意义。非物质文化概念的提出使民间文化具有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价值认同。应当说，民间文化是作为具有民族社区发展价值和文化多样性标志象征的社会资源，进入国家文化理念和主流文化视野的。或许，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资源（资本）对乡村发展意味着什么。

2001年我们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初始，在采用教科文世界遗产中有形与无形遗产类型概念界定非物质文化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本土化语境理解的价值概念——“活态文化”。这一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形象通俗、包含丰富地推介了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和内涵，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此概念点明了不同民族“文化认同”的独特方式——即不依赖于文字和书写传统的活态文化特征。在这里，活态文化概念不仅反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口传身授的文化活态传承方式，也以活态这个中国人易于接受理解的文字语境，凸显出教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强调的“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意识。

“活态文化”概念的提出过程，引发了我们一个重大的思想价值观的改变，启发了我们对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文化判断上的重新认知。汉字作为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得到了中外汉学界的公认，同时被列为最核心的因素。由汉字构筑的书写传统，以及在书写传统价值影响下的物质文化创造对中华文明持久性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汉字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能够涵盖多民族文化内涵的代表性因素。

中华民族几千在文明没有中断，文明的文化之河生生不息地传承到今天，人本因素上的文化认同、文化传承的维系，以及文化多元多样性的和蓄存在同样是文化持久的最基本因素，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文化的传承、传播与记忆可以有多种物质承载方式，但人作为文化传承、记忆、传播的生命载体，应当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原生的“内核”因素，也是最本源的文化存在。由不同民族群体之人

传承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创造是最具繁衍意义的活态文化基因，这正是民族生存发展下去的情感源泉和生存精神依靠的再生动力。乡村里的活态文化有如古老的河床，在生活的漫流承载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真实的文化脉络和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活态文化是中华民族无数劳动人民以人性情感维系的根脉。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不是教科书和文本的专著在维系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不同民族乡村的农民群体以他们播种、真实的生存方式在维系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底线，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了的文化事实。几千年农耕文化历史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了以汉字和汉字形成的书写传统价值观去评判文化的高低，我们屈从于话语权掌握者的文化好恶观。几千年来我们的官方和精英主流文化很少从一个乡村、一个地域的农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中去发现、倡导对乡村民间文化的尊重。乡村里的文化像生长在田野里的树和庄稼，活态文化传统就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活态文化的基因种子正是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里传宗接代、传递至今的。古人讲“礼失求诸于野”，那是因为乡村的活态文化是一部没有失忆的书，是一部无字的文化史，是一部由人的记忆构筑的文化基因库。对文化的新旧之分，只是一种表面样式的判断，只有把文化的价值判断回归到人性的基点，才能真正发现其智慧和和谐的创新和更具人世魅力的光彩。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不是以时间的级序呈级品质的进升。手段的进步与高明，也不意味着精神含量的升华。当我们走进乡村里的文化传统，许多民族文化仪式中都体现出对自然天地所敬畏之心，都反映出对祖先前辈的敬仰之情。在任何一个民族乡村节日里，乡民们面对自己的文化是自信愉悦的，是朴素健康的，是人性群放的。而在不同民族乡村的文化仪式习俗中，眼神感人的民间艺术是仰止的丰富多彩、感人至深。民间艺术是穿越了时间的文化故事，把祖先光的创造和后代的传承融在了一起。任何一个村庄里的文化细节都凝结了无数代人天才的智慧，乡村里的活态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数代人总体天才能量的结晶，这正是民族存活下去的无数根脉的由来。

汉字的根性是由人行支撑着，书写传统造就的文化经典，是由民间生活的常识托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不仅有官方的版本，同样还有一个活态的民间版本。火药的发明造就了民间节日烟花爆竹的声像符号，成为至今久盛不衰的节日象征；鞭炮也造就了民族像那纳福、吉祥如意的节日文化心理。木版印刷术造就了平民民间木板年画的兴盛，也孕育了乡村非文字文化启蒙的“读图时代”。印刷术的复制传播功能，不仅使书籍发挥了文化记忆、传承、创造的历史推动作用，也使木板年画发挥了人伦教化和文化记忆传承传播的作用，并维系了民间文化信仰的传递。造纸术的产生使汉字和书籍、书法绘画作品流芳百世。纸同样也是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如木版年画、纸马、剪纸、敬神用的神龛和黄纸钱、世俗用的纸扎、过年的喜庆等。纸在民间不仅是纹样符号的载体，也是通神及与祖先亡灵沟通的媒介。民间剪纸不仅在民间节日和婚嫁习俗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服饰纹样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指南针的发明影响了古代天文、军事、航海等多领域的事业发展，在民间，和指南针相关的罗盘极大地推动和普及了风水术的发展，在风水观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村庄，反映出自然与人居环境空间的深刻关联，蕴含着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责任信仰文化。

在20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走过无数个村庄，无论是湖北的窑洞，还是安徽的乡村民居村落，无论是贵州苗族的吊角楼，还是江西的客家围屋、福建的土楼。那些被麦田、玉米地、稻田、山林、池塘簇拥着的村庄，应当是中国最天然、最清新美丽、最朴素动人的园林资源。那些上千年、几百年在大自然田野中生长起来的古老村庄，是最具人性魅力和文化色彩的自然园林。这是新建的水泥城镇永远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审美范本，也是民族不可再生的文化象征。21世纪的村庄，已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最后一道风景。或许，这些充满了天然审美价值的人性化村庄在当下城市的股市行情里增加不了几个百分点，但它确实让每一个走进村庄里的人为之动容。在时间的长河里，财富的价值不都是以货币兑现的，财富有时需要时间的沉浮，让后人去收获。面对全球化、现代工业化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或许，中国乡村最需要投资的是人性审美的创造智慧，只有智慧才能保存下来人性价值的审美财富。“新农村建设”，我们不能拆掉那些不可再生审美和具审美财富价值的古老村庄的“银行”，建起现代化水泥玻璃的“售楼处”。村庄，是属于世代人民的财富。

(2006年1月完稿)

目 录

白坪·多民族乡村的活态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特牲性因素新探	/1
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公共性	/1
非物质·关于精神遗产的理解 ——《活态文化》写作札记	/6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美术分类	/11
关于民间美术分类相关问题的探讨	/20
中国多民族乡村的文化资本与新农村建设	/27
无形遗产申报·文化尊重离农民有多远 ——中国民间无形遗产申报手记	/31
关注现实·以无形遗产申报推动本土文化的传承发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36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问题研究	/42
民间美术保护的文化原则	/46
心灵的谱系 ——不同民族乡村生活中的色彩象征	/52
正在消失的母亲河 ——作为无形文化的中国民间剪纸	/57
剪花图典 ——中国乡村民俗生活中的剪花娘子与剪纸	/66
金钥匙 ——靳之林和他的中国民俗文化探源丛书	/77
太阳·符号的信息 ——不同民族转太阳文化观	/79
符号的故事 ——人类的生活与艺术	/82
青年群体是一个民族面向未来的文化基点	/106
文化的身与心·走进西塘	/109
生生不息的福地 ——一个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基因库	/112
国家文化遗产日·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正在开始	/115
中国皮影·人类的文化遗产	/118
人类文化遗产·对话的桥梁及其灵感的源泉 ——中国剪纸与芬兰艺术《芬兰民族》	/120
娜拉与中国剪纸 ——挪威现代舞戏剧《寻找娜拉》中国剪纸版舞台美术设计手记	/1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共空间的传统节日 ——关于中国文明转型期节日文化的思考	/126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民间美术田野调查方法 ——文化遗产学系本科田野教学初探	/130
朝向人类心灵的谷底 ——奥地利文化遗产考察手记	/136
主要学术及艺术活动	/147
田野考察年表	/149
后记·崛起中的复兴·一个文化自信与开创的时代已经开始	/150

Contents

Preface, the living cultural tradition of multinational villages, a new survey of the factors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persistence	/1
Focus on the commonality of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for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
Intangible heritag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iritual heritage, the notes of living cultures	/8
The classification of folk arts as a kin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1
Research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folk arts	/20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villages	/27
The declar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ultural respect and the peasants, the notes of the declaration of Chinese folk papercut as an intangible heritage	/31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propel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ve cultures by intangible heritage declaration	/36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42
The cultural protection principles of folk arts	/48
The pedigree of spirit, color symbols of the country life in different nations	/52
The vanishing mother river, Chinese folk papercut as an intangible culture	/57
The catalogue of papercut: the female papercut masters and their works in the villages of china	/68
The gold key, Jin Zhimin and his collection on the original research of Chinese native cultures	/77
The sun, the message of symbol, the sun cultural conception in different nations	/78
The story of symbol, the living and fine arts of human	/80
The youth, the cultural basis of a nation aimed at the future	/106
The body and spirit of culture, visit to Xitang	/108
The eternal fortunate place, a living gene storehouse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112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Day, the beginning of a cultural self-conscious period	/115
The Chinese shadow show, a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	/118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the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and its origin of inspiration, the Chinese papercut and Kalevala the epic of Finland	/120
Nora and the Chinese papercut, the notes of stage art design for Norwegian modern dancing drama hunting for Nora	/122
The intangible cultures continu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 of public space, thinking on the festival cultures at the transform period of Chinese cultures	/126
The investigating methods of field work on folk arts as an intangible culture, abstract of field teaching for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heritage	/130
Towards the recesses of human spirit, the investigating note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ustria	/136
The writer's resume	/147
The main academic and art activities	
The chronology of field works	/148
After word: A rising revival, the era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founding has started	/150

Ben tu jing shen
2007年1月第1期

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公共性

21世纪初，一路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渐趋平稳，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以往的民族民间文化被冠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迅速升格为标准的国家体制行为，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政策措施、项目保护资金、相关遗产申报保护的机构等应运而生。而面对社会，媒体对该词及相关内容的报道和传播也创下了前所未有的使用频率。“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转型期中国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化流行词语，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为什么教科文在世界遗产中增补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项目，在中国产生如此快速强势的社会效应？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历史中一直处于边缘弱势和身份价值摇摆不定的民间文化，会一夜之间成为国家议事日程和主流文化舞台的关注热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文化保护事业，但眼前发生的事项更像突来的“公共事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语发生并迅速普及了，但其真正的内涵意义和连带的问题人们并不太清楚，也来不及深察细思。许多遗产地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争取品牌申报和专项资金的运作项目，许多高校也开始将其作为新的科研课题内容，而传媒由于无法实现相关田野信息的深入调查，更多着眼于表面事项和已有知识及资讯的传播，颇有民俗猎奇探秘的心理和“走马观花”的风格。在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受到了忽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村农民群体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相关公共性问题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性的关注，



陕西凤翔泥塑虎（民间泥塑）



陕北黄川乡村堡春节时的秧歌队，秧歌舞者的头饰像古代官员头上的冠帽，秧歌的舞姿中也蕴含着许多古老的文化记忆。

在拷问着这个时代人文精神品质的人性含金量，也是验证国家文化理念中主体文化意识和文化创意决策是否自信成熟的试金石。面对几千年多民族劳动人民群众为传承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世纪中国文艺的复兴，正是发端并植根于活态的文明土壤之上，无视这样一个公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背景的存在，去奢谈什么文人精英的文艺复兴之梦，实在是狭隘幼稚、孤芳自赏的表现。道理十分简单，回首以往，王族精英们面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和诸多传承人平等、缺乏公正的社会问题时，总是鸦雀无声，我们面对社会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和具有独立批判性的文化判断力是苍白无力的，这样一个面对社会真实生存事件失语的精英群体，又如何有能力去肩负一个几千年深厚文化传统的再造和复兴使命呢？我们不能再只沉溺于象牙塔高的文字神圣性了，思想失去了生命的行动，就只能文字而不是思想。

作为活态文化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不是主流文化以外的另一种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中华文明传统的活形态表现，同样是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中重要的核心因素之一。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也是当今国家构建文明和谐社会和多民族社区和谐共存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遗产类型本身的可持续性，

更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传统，关联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信仰，到不同地域和幸福指数相关的衣食住行，以及作为地方文化资本向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持续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等诸多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我们应当欣喜地看到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上许多重要举措的实座，这首先反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价值观的实现和弱势身份的改变。几千年封建农耕文化的历史，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高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由国家意识和体制把乡村农民为传承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上历史舞台，这应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意味着千年少有的民族文明内部整合发展机遇的到来。如果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正是从这样一种历史转型期民族文明整合创造的自信自觉意识发端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表面看是着眼于文化传承，但更深层的意义是关系着国家、社会以及乡村社区发展公共空间的价值实现，其利害关系是超越了个人和遗产本身的。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被置放在激发公共领域的整体社会存在背景中，不去思考关注其潜在的价值意义，不去解决处理好复杂相关的社会问题，保

护就会成为一种孤立人为的“工程项目”，而非人文的公共关怀。以往我们的主流文化精英习惯于肢解活态文化的整体形态，去选取所需的文化资讯，然后看准自己编织的文本体系，文本成为文化的主流产品，而真正的文化交融洒的洒槽被抛弃于田野。这不仅本末倒置，而且是极度缺乏公共空间人文关怀在线的表现，而体制内的文化管理，以往过于注重政绩和形象工程，使真正的文化传承群体沦为弱势和边缘。

面对浩如烟海的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冷静清醒地看到，中国作为火遍中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以及相关的社会及文化创意管理水平，我们面临活态文化保护的经验和智慧应变的管理能力等多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艰难棘手的问题。作为已入选教材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应当给予全力的保护和传承的启迪与支持，这并不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该传承社区的当代社会发源和可持续的问题，是文化传统

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创造的问题，是不同社区民族传承群体文化自信、自觉性提升增强的问题，是文化资本向文化创造转换延伸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社会的公共性，必然超越个人及地方本位的利益。国家作为社会的主体意识，首先应当确定文化权益和文化利益的基本归属权，以及文化在社会价值认同中的公民所属权益的平等性。国家应当在社会公共领域不断完善，兑现公民文化权益应有的法律、法规，文化政策及产业化管理规划，以及文化公共性所需的社会交流、传播等信息使用方面的基础设施。文化的公共性是需要全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需要国家体制和民间社会道德共同认同维护其最基本的人性底线。文化的传承发展如果失去了社会公共领域的人性道德底线，文化会异化为个体或集团利益的工具，也会成为经济价值的从属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曾经的强入，即在于民间公共社会发挥的精神力量和生存情感的认同支撑作用。而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脆弱性，也正是因为近百年其在社会公共领域中不断地趋向边缘化边缘，



贵州苗族六枝的梭理是中国和挪威政府合作创建的中国第一家生态博物馆，这座城市在挪威馆的影响，以自身的立场传承保护，展开了从来没有过的一幕生活



鄂尔多斯市蒙古族舞蹈队（王虹川拍摄）



贵州黔东南苗族乡寨迎客的队伍。许多苗族乡村，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具有公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安顺黄坛春节时仍保留着古老的舞龙传统。作为活态文化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是中华文明传统的活形态表现，是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之一

以及不公正不平等的文化遭遇。其实，在亚洲地区，日本、韩国等现代工业化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观正是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公共领域得到了普遍的文化认同，并保留延续了代表性项目的仪式及手工艺传统的存活。但实际上在日韩两国已经工业化了的日常生活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源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精神和文化情感的认同却一直自觉地保留延续了下来，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日韩两国对本土民族精神基因的认同与提升，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发展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这是我们在日韩两国现代社会中能明显感受到的归属于各自民族的精神气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社会历程，人们开始只看重于经济和现代化科技进步发展的追求，把物质生活和财富积累方面的追求作为主流的价值观。随着国家经济快速的发展和社会不断的进步，民众对社会的发展和生存幸福的认识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公共领域的许多热点问题，尤其是社会负面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进步，大家对社会的参与意识增强了。而国家在不断的体制改革中，也开始从注重经济发展，GDP增长，逐渐向构筑和谐社会和和谐社区的方向发展。这些大的社会因素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发展基础。我们相信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性的关注，不仅推动文化认同、文化记忆和活态文化传统可持续发展，更深层的现实意义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健康有生命活力的和谐共生发展，正是依附于民族生命机体内部精神活力的文化创意热情。这种热情正是围绕民族生存发展的真实现实发生发展，觉悟成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为生存的活态文化，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变换发展，演变、消失，但以人为主体的生存创造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回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为生存而行动最壮烈最激烈的正是来自乡村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为当今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付出了最艰辛的血汗，获得的却是最低微的酬劳，甚至没有酬劳。而我们的文化精英群体行动迟缓麻木，尤其是面对社会公共空间的麻木，许多人热心做的只是媒体知识名人。21世纪是人民的时代，向人民致敬才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希望所在。历史证明，在但丁时代，在《格林童话》的收集时代，在芬兰《卡莱瓦拉》史诗的成型时代，都证明了文化人民性的力量和人民文化觉醒对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



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的牧包，射野马是蒙古族重要的信仰与仪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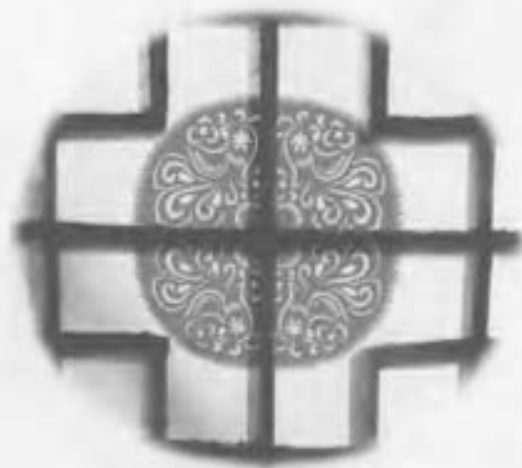


河北邢台农村乡村一个参加春节“打靶”活动队伍的儿童，乡村里的孩子们正是在这种具有公共性的习俗仪式中开始接受传统文化滋养的。

非物质·关于 精神遗产的理解

《活态文化》写作札记

Ben to Jing shen
2005年2月完成



陕西秦晋时的剪纸窗花

活态文化是我最初推介教科文新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本土化理解，它简洁、鲜明、形象，易于推广和接受，同时也提出了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中人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所要关注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教科文2001年在《世界遗产》中新补充的一个评选项目，全称“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教科文《世界遗产》1972年启动时，主要是以固定空间形式的物质遗产(有形遗产)为主要评选对象，其中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其主要特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不同时期的文化创造遗留物，以及反映自然进化和自然生态独特性的自然遗址和自然景观。非物质针对静态物质遗产而言，主要指向以人为本的精神的遗产，指向生存形态的活的文化，指向具有生命繁衍意义的文化基因信息。

非物质文化的基本特征是：

1. 以人为本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活态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最重要的整体性特征。非物质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空间，而非单一的文化样式，强调的是活的整体。民间文化是一个活态共生的整体，围绕着族群群体生存信仰体系的文化认同，整合了多类型的文化艺术形式，并以不同时间中的文化空间去实现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主题，节日文化即是典型的活态文化共生类型。因此认知非物质文化不能以割裂、移位或有悖于民间文化共生的整体性原则方式去认知它。

2. 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及其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是一

定民族社区经久积淀的文化传统，是历史性与现实性贯穿一体的文化存在。比如民间节日习俗，它是民众自发传承并集体认同实现的。因此，不同民族社区的文化传统会通过群体认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去传承发展。文化表现形式即是那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类型，如口传的史诗、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歌、戏曲等，民间美术类的剪纸、刺绣、年画、窗花、雕刻、漆器等手工方式的图形、器物制作等，以及艺术综合类的傩戏、皮影戏以及大型祭祀文化空间等等。文化表现形式是精神信息的载体。针对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的河意常常引起人们的困惑。因为除去口传方式的善理形式，视觉造型的表现形式都是具有通常所说的物质属性，为什么又说是非物质的呢？从信息（Informatics 拉丁文）的角度来讲，任何一种文化信息都会有自己的物质载体，否则无法承载信息和进行交流传播。它是物质与物质进行交换的内容。比如汉字符号，即是承载文化信息的物质形式，文字形成了书写传统，极大地推进了文明的进程。但这个传统并不掌握在民间劳动者手中，而是被官方与少数精英系统使用着。非物质文化的民间叙事传统是非文字、非固定空间形式的，是以人口传身授的文化行为实现传统精神的。所以，民间文化传统常以口传方式和图形符号的象征方式传承文化的。但这里口头传唱、造型造物都不是为了艺术的目的，而是为生存信仰情感的需要。声音与图形只是传达无形精神的一种媒介和手段。比如巴人入选第二批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古琴音乐，其意义是通过古琴来保护传承即将消失的古老音乐传统。那曾经以高雅之心面对自然生命创造出的天籁之音

——古琴音乐，无疑是人类音乐史中的精品。古琴音乐只有通过天才的传承人才才能真正地保留传承下去。古琴放在博物馆和藏在民间都不会消失，但古琴如果没有后继的演奏之人，那古老、独特、高雅的音乐精神将不复存在。因此，物质的表现形式只是一种作为载体的消息，其内核即是我们发现认知的无形精神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没有物质手段。这里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活的精神遗产，活态的文化表现方式的独特性。活态文化概念的提出，旨在补充认知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时常常被忽视的活的文化传承方式，以及活态文化中的根性文化信息。我们确实长久地忽视了人民口传身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才传承人。“五四”以来，我们已了解了一个文本的西方文明，同时我们也仿照着把中国文明文本化了。我们至今还不习惯去认识我们自己活态的民间中国；认知一个活态的中国传统。我们尤其不习惯从活态的文化生活研究中去发展学术。我们已经习惯了西为艺术和文人艺术的美学判断方式和价值观，我们认知民间文化艺术很少关注到作品背后创作者的存在，缺乏对民间文化艺术传承方式的理解，以及对传承群体之人的文化尊重。不同民族社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都有其代表性的天才传承人。正是他们一代代人的文化传递，才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中国民间剪纸在申报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确立了20多位不同民族社区的天才传承人。有些在申报遗产过程中已经去世了，这些天才传承者不但记忆传承了社区的文化传统，也是艺术创造的天才。像刚刚去世的陕西旬



贵州肇兴侗寨村寨里唱侗歌大歌的侗族舞。分产前的侗族大歌，成为侗族人最崇拜的生活传统之一，也是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北平乡县春节打腰鼓的民间舞蹈“拍鼓灯”。灯上拍鼓是近年出的新式。半全属于太平鼓的变种（本义，在黄县）。“拍鼓灯”反映了太平鼓和黄巾起义对民间艺术的影响。



除夕春节的前夜灯笼花。中国北方的许多乡村，过春节总是从贴春联、贴窗花开始的，窗花是春节文化空间中的典型象征。

昌黎花娘子库淑兰的彩色剪纸创作，既代表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又表现出民间艺术家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反映出民间文化独特的人性魅力和文化光彩。关注保护中国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才传承人，是无形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教科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标准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系申报因素之一。此因素即在强调保护即将消失的具有独特性价值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标志性地证。这对于中国多民族、多样性文化的保护具有很大的推动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以濒危的态度和方式去保护，都濒危了，文化何以传承。以活态文化的理念去认知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的生与死是辩证的，在这里“濒危”不仅有将死之患，也有再生之机。而事实上，不仅人类社会，大自然的生命法则也是在不断的生死交替之中繁衍着生命的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只是一种价值认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文化要健康而有生命活力地传承发展。文化的本质意义也正是指对生命生存的发展过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在中国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首先，它使民间文化传统走出边缘化的弱势处境，作为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进入国家整体发展的视野，也预示着全球化背景下新的民族文化整合时期的开始。中国政府加入教科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世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都标志着党和国家在21世纪文化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始自信地向民族自身寻求活力、智慧和创造的开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传统的中国带来很大冲击，另一面，又是激活中国传统发展创造的契机。事实上中国传统精神的特征之一即是具有极强的文化融合性，活态的文化正是在不断创造发展中守恒的。传承悠久的活态文化不是包袱，也不是将死的遗产，其正是我们生存智慧的经验基础，是我们面对世界最本原最朴素的生命方式，是我们探索新的生存发展方式的精神和情感动力的源泉。21世纪，科学的发展也从认知能量、物质后开始又一个认知信息的时代。中国丰富多彩、多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一个活态的文化多元的信息库，是我们促进人类现代化多元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

完成《活态文化》书稿并不轻松，因为一切刚刚开始。《活态文化》不是一本理论式的教科书，其中记录的是我们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学科和民间剪纸申报无形遗产过程中，关于现实问题、文化思考以及实践模式和开展的社会项目的总结梳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明转型期急剧变革的现实：本土农耕传统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上，下裂分野以及缺乏整合和不平等的社会价值观；高校无形文化新学科建设人文精神的价值选择和学术实践理念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我们诸多的反思。应当说《活态文化》是一本实践的行动之书，是我们对公共空间中民间文化和传承人的关注之书，也是一本向人民文化创造传统的学习之书。^②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文化上下禁分野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长久的对活态民间文化的忽视，使我们过于沉迷于书写传统中的经典，而忽略了生活中常识的意义，忽视了存活于人之记忆传统中的民间情感文化方式，忽视了民间人本的生存智慧对与形传统经典思想的人性滋养和文化“同床”作用。一部老子《道德经》几千年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史中罕见的现象。文字构筑的文明之花，何以经历几千年人间沧桑，王朝更迭而常开不败？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历代一个个伟大的哲人都在经历了自己的磨难后隽版在历史的画卷中。因此，我们质疑，文字的《道德经》果真如此持久的生命活力吗？文字的根性是什么呢？其实五千言的《道德经》早已成为言行相高的文本象征，我们的发展理念已经遗忘了老子“天人合一”的共生哲学。老子智慧的自然辩证法在天南地北雷同的水泥都市中早已荡然无存。

但人们仍在不厌其烦地进行着“我注六经”的文字活动，《道德经》崇尚的“道”之无形精神，早已化解在民间生存的伦理信仰和日常生活行为中。所以，今天我们在陕北的民歌、苗族的古歌和许多民族古老的节日祭祀庆典仪式中可以感悟到言与行的真，感受到人之口传语言的神圣性。而文字的神圣更换为一副圣人权威的面孔，我们往往不假思索、毫无批判精神地顶礼膜拜，作为经久不衰的文明之花《道德经》，明证了一个朴素的事实，文化只有深深扎根于大地，扎根于活态的文化“沃土”，扎根于人的记忆，文明之花才能常开常新。大地上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活态文化和人对古老传统文化的守护，才是文本中经典思想久盛不衰的真正秘密所在。或许常识隐藏着文字久已失传的古老经典，隐喻着古老经典形成前更本原的精神方式和生存选择。在这里，我无意把文字与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对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现实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但从

某种意义上讲，又都具有一种共生、互补、和谐相生的意义。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认知，我们应当树立起以人为文化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背景的文化整合的认知眼光。我们认为民间文化必然消亡，必须转换为文本记录放在档案库中，这样的文化判断取决于多少事实的调查、分析和评估，谁又是文化生死价值的裁决者呢？这背后又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中心主义呢？文化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既表现为权力意志的象征，又表现为日常生活的生存常态，但时间在文化强、弱双重的价值观中，谁在拨动着时间的钟摆，谁又代表着一种“道”之时间步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时间的文化根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民族时间根性的体现，时间之维成为我们认读民族本源根性的必由之路。从汉代大一统文化观的形成，文化的时序有了一个汉族中心的经典，其实许多少数民族在大一统的文化时序中至今仍保持着本民族的时间根性，这在多样性的节日文化中



贵州黔东南山区苗寨里的苗族老人，她日常生活的服饰和头饰，仍保留着典型的民族特征，更重要的是这些老人记忆着许多口传文化的古老传统。



苗族刺绣作品《梨花娘子》，苗族人的彩色刺绣，象征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又表现出民间艺术家天才的艺术想象力。

体现得最为鲜明。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力推中国与世界同步，选择了与西方时间同步的公历时间。1949年新中国政协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使用公历时间的议案。可以说，我们近100年来一直生活在两种时间中（这是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非常有意味的令人深思的现实）。一种是和西方格林威治时间相关的公历时间，另一种是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农历时间。两种时间的共存中，我们生活得平安无事，因为农历时间的根性在主导着民族生存心理的文化时律。20世纪末，开放的中国开始体会到两种时间文化带来的冲突，也体验到这种冲突带来的生存变化和动荡的生命活力。21世纪初叶，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开展，人们开始意识到时间根性存在的价值。因为两种时间的平衡被时间文化的冲突打破，常识开始发生变化，经典似乎还在推崇为经典。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中国的许多约定俗成的东西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失去往日的活力。非物质文化的现实处境，引起了许多人心急如焚的情感关注。文明转型期是否就意味着传统失落的必然，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否就必然以固化的方式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保留剧目。现实生活的混沌性，多重性总是在找寻着一个时代的聪明，考验着一个时代的智慧，摆弄着时代良心道德的天平。非物质文化保护需要的是人本关怀，而非文人关注，需要的是多元文化的聚合与共生，而不是主流文化去拯救什么，对非物质文化过度的恐惧反映了我们对民族文化根性的不自信，中华文明几千年正是在不断的融合发展创造中延续的，何需今日落地不动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一种公益事业的关注，一种文化策略的实施，一种教育方式更长久的传承，也不仅仅

是一种宏大的社会工程。我们最希望非物质文化在其生存之地健康的传承，作为社区象征和情感源泉的非物质文化的存在究竟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当信息化时代现代生活方式使人类的身体负载的靠近之时，冲突加剧了，沟通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人类间心身和谐地相处生存远不是一件依情感转移的事情，当宗教方式已不再成为人类生存心灵最佳的“根本转变”方式，人类完善自身和谐共存又依托于什么呢？心灵的干涸又仰仗什么精神之水源润丰富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们提供了关联到每个生存者切身生活的返祖和思悟，提出了一种将理想扎根于脚下土地的生存自信和觉悟，也提出了一种期待长久被忽视的边缘、弱势文化持续发展的愿望。当我们意识到精神遗产生生不息的秘密并不依托于书斋中的文字游戏，或某个朝代的权力意志，消解了文字神圣的面纱，翻去了一页页王朝的更迭，人的身心便渐渐清晰了出来，非物质正是在人的生存行为创造中，才显示出其真正的文化光彩、细节魅力和发自内心信仰的力量。

参考文献：

- ①《周易与中医学》，杨力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6月第3版。
- ②《活态文化》，乔晓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贵州雷山县的高江是中国最大的苗寨，号称千户苗寨的高江保留了完整的吊角楼村寨形态，也保留着苗族许多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



Ben tu jing shen
2005年8月创刊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 民间美术分类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研究文化的第一步，应当是把文化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并给这些部分分类。”^①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也阐述了分类对研究的意义，他指出：“知识的每一分支，在成为严肃而周密的研究对象之前，对它进行分类是必要的。曾几何时，漫无目的的事实搜集和草率创立的理论就构成地质学和植物学。只有当这种逸事趣闻性的研究阶段让位于系统性分类，它们才走向了真正进步的和方法彻底的研究。……研究地方性和民族性传统的学者，需要内容丰富的分类来激励自己拓宽视野，但从事世界性、比较性研究的学者甚至更需要它，以便在无目的的游击中稳住阵脚。若没有分类学者和编目学者的帮助，他是不可能研究得更广泛的。”^②

“科学分类在实际中的主要用途是列举和归类”。^③中国作为世界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近8000年的农耕文明延绵不断，积淀了丰富深厚的多民族、多样性的民间美术传统。但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及文化领域内对本土民间美术的田野调查及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一直是十分薄弱和缺乏系统性的。而关于中国民间美术的分类研究，以及在科学、整体、深入细致的田野普查基础上梳理出来的分类编目和主题性的分类索引，这些最基础的学术建设几乎还是一个空白。21世纪初叶，教科文在《世界遗产》中新增补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④，把涵盖着民间美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到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层面和世界不同国家主体的文化日程上来。中国作为首批加入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北方民间陶瓷·鱼盘



山西民间剪纸（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品）



山西民间皮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品）

约》的国家，迅速在国家机制中启动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项目工作。对于处在农耕文明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传统，如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下可持续地传承和得以有效保护，这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由于古老农耕文化深远的历史背景，非物质文化包罗万象，种类繁多，文化内涵深厚而又多样复杂。如何更好地认知和传承保护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人类文化遗

产和世界文化格局背景中去发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独特的文化价值，这就需要首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最基本的分类，也需要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本身做出最基本的分类。“归类”不仅是从发生学角度及历史沿革中去分辨、归纳、梳理出某一文化艺术类型的基本形态结构、文化功能和语言特征，寻找出其最基本的存活、传承、演变的规律和文化信息系统。对于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意义上的“归类”，也是对以口传思维和视觉图形叙事手段文化传承方式的认知过程。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中，以往我们过于注重以汉字为核心的精英化书写传统，而忽视了非文字的以人民为本的活态文化传统，忽视了数千年无数劳动人民群众作为文化生产力的创造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学，其实就是对人民传承创造的活态文化传统的分类学，人的因素和人性化的研究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不可缺的原则。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美术分类，不仅对民间美术研究和民间美术学科建设具有长远的学术意义，更重要的是对目前正在开展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现实意义和基础性的建设意义。科学而又人性化的分类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科学、有序、健康实施的基本保障。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本土民间文化研究方面首先发起的是相关民俗学的研究，主要关注领域在民间文学、民间风俗等方面，民间美术虽然也经常在一些研究口传文化的民俗学者提及，也曾以“民间工艺”、“民俗物品”、“乡土艺术”等名分进入当时不同性质的展览和博览会，但真正意义的以民间美术研究为主要领域的学者群体并没有形成，也缺乏有真正田野意义和系统深入研究的民间美术学术成果。那个时代的民俗学者意识到了民间美术对民俗研究的传证价值，但由于民间美术自成体系的独特艺术叙事方式和复杂多类型的民间造型（器物）艺术研究所需的专业知识背景，使许多以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神话学等以文字语言为主体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的学者未能深入涉猎民间美术研究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白话文革命，冲刷了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书写叙事传统，也从语言叙事方面推动了文学平民化、大众化因素的发展。但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其主流是以西方欧洲艺术传统为主导价值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领域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桥梁上，由于缺乏语言文学方面的“白话文革命”过程，在社会化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上，本土的艺术传统是没有太多实质性位置的。但我

们也可以从那时的文化艺术精英中找到他们个体对民间艺术的关注和热情。比如，1931年从欧洲回来的徐悲鸿赴天津讲学时对“泥人张”等民间艺人的拜访，并撰文称赞民间艺术可与世界著名艺术大师作品相提并论；^①1933年至1938年，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的常任侠，安排学生对南京周边地区民间年画的收集；^②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钟敬文在杭州筹办“民间国画展览会”；^③1930年至1946年间，在蔡元培倡导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许多学者开展了对中国多地区民间艺术、手工业传统方面的调查及实物收集，以及举办主题性的展览。^④接近20世纪中叶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民族解放战争，刚刚兴起的民间美术收集研究工作没能延续下来。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研究重又兴起后，民间美术仍然处在民间文化领域薄弱边缘的地带。

但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民间文化因为革命时代的需要而有了另一番不同的境地。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和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学习的文艺方针。延安鲁艺的师生们积极投入到了民间生活的“大鲁艺”。古元的木刻是那一时期受到民间艺术审美和民间生活影响的代表性作品。延安时期的艺术观念，倡导艺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种艺术思想30多年以后影响并促成了后来



贵州苗族乡村的民间竹编

中央美术学院“年画、连环画系”的成立。1980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江丰，他作为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正是由于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钟情和热爱，向文化部申报建立了“年画、连环画系”，1986年改建为“民间美术系”，2002年改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民间美术的研究开始有所发展，在大学、研究所和基层的民间文化干部中开始形成一定的民间美术研究群体。难能可贵的是，许多民间美术研究者风尘仆仆地进行田野调查，兢兢业业甘于寂寞，几十年始终如一地从事民间美术研究事业，是他们为民间美术的分类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



山西民间年画印制图（民间绘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陈列室藏品）



山东高密扑友年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陈列室藏品）